

江苏公安作家丛书

骆圣宏 / 著

预约报警的女人



群众出版社

江苏公安作家丛书

骆圣宏 / 著

预约报警的女人

预约报警的女人

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预约报警的女人 / 骆圣宏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4. 11

ISBN 978 - 7 - 5014 - 5289 - 7

I. ①预… II. ①骆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41969 号

预约报警的女人

骆圣宏 著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

印 张: 9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26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5289 - 7

定 价: 32.00 元

网 址: www.qzchs.com

电子邮箱: qzchs@sohu.com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期待江苏公安文化的春天

祝春林

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、大力推进文化强警战略的重要时刻，《江苏公安作家丛书》编辑出版了，这是江苏公安文化建设取得的又一显著成果。

公安工作的根基在基层，公安文化的根基也在基层。多年来，各地公安机关在坚持政治建警、从严治警的同时，牢固树立文化育警理念，积极探索具有时代特征、体现警察特色的公安文化建设新路子。各级公安文联紧紧围绕公安中心任务，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，努力培养公安文艺人才，为推进公安文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。江苏公安文联成立六年来，在江苏省公安厅党委的坚强领导下，确立了“打基础、上台阶、求发展”的工作思路，积极发挥职能作用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，成立了五个门类的专业协会，实现了十三个地级市公安文联组织的全覆盖，赢得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基层民警的普遍赞誉。

这次编辑出版《江苏公安作家丛书》，是江苏公安文联推进公安文化建设、繁荣公安文学事业的一项重要举措，既是对最近

一个阶段江苏公安文学创作的一次汇集和展示，又是对今后江苏公安文学发展的一次激励和引导；既是对基层公安文学人才的扶持和帮助，又是对涌现更多公安文化人才的期待和呼唤。相信本书的出版，能对宣传江苏公安在新一轮平安建设中取得的重大成就、进一步弘扬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、增进社会各界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发挥重要作用。

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，也对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包括公安文化正面临着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。衷心希望江苏公安文联进一步提高文化自觉，增强文化自信，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，大力支持、积极鼓励、正确引导公安文学创作，努力为广大公安文艺工作者创造良好的创作条件和环境，推进公安文艺创作和公安文化建设的大发展、大繁荣。热切期望广大公安文艺工作者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，坚持解放思想、与时俱进、推陈出新，创作出更多、更好的具有强烈时代特征和警察行业独特魅力的、思想性和文学性俱佳的精品力作。

我们期待，江苏公安文化繁花似锦、万紫千红的春天早日到来；我们深信，江苏公安文化一定会成为全国公安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派壮美秀色。

是为序。

2014年10月10日

（序作者系全国公安文联主席）

牛背上的梦想（自序）

骆圣宏

当下的中国，最热的词，当数“中国梦”。她给无数国人以无限的遐想与激情、梦想与希望，同时撩起了许多人的人生回望。

孩子很小的时候，常常感冒发烧，到医院里打针挂水，我们就问她，骆驰长大了想干什么呀？她毫不犹豫地说，当护士。我们问，为什么呀？她说，可以给人打针。在她的心目中，能给人打针，让别人很疼，应该是世界上最厉害、最了不起的事。她上了幼儿园，我们再问她时，她的理想就变成了当老师。问她为什么，她说，当老师可以训小朋友，还可以打别人的手掌心。上了小学、中学以后，她的理想更是不断地变化：上清华、上北大、当明星、当作家、当主持人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女儿在梦想的牵引下快乐地学习、奋斗着，对上学读书充满了兴趣。

经常和女儿谈理想，说的都是她长大后想干什么。突然有一天，我问她，你知道爸爸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吗？

她歪着小脑袋，眨巴着明亮的眼睛，认真地打量着我。我现

在是警察，所以她首先想到的是警察。我说不是，她又说是科学家……我说不是。她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，费劲地把自己能想到的都说了一遍。我说，是想当乡村道路上的“马路工人”。她以为听错了，睁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。我又说了一遍，告诉她就是县城通往奶奶家的那条马路上扫马路的清洁工。她忽然大笑起来。她想不到，在她心目中一向高大的爸爸，小时候这么没志气。于是，她拍着小手，做着羞我的动作说，你小时候就这么大点儿出息啊！

然而，小小年纪的她哪里会知道，就这么一丁点儿的理想，对当时的我来讲，也是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”！

记得我八岁的那年夏天，一天晚上，从生产队收工回来后，父亲在地上切猪菜，母亲在灶台边烧火。灶台上点着一盏“鬼子灯”。我立在灶台前，玩弄着锅盖上的一把筷子。母亲说，宏儿头，你数数看，看能数到几。跟我同年的甚至比我小的，前一年都被大队和学校动员去上学了，而我还不识数，父母亲就说等等。我把锅盖上的筷子一、二、三……地数，竟然能数到十了！母亲对父亲说，宏儿头能去上学了。然后叫我又数了一遍，真的能数到十了。到开学时，父母果真把我送进了学校。由于人家已上了一学期，我怎么也跟不上，作业和考试十有八九是零蛋，非常难为情。没办法，父母只好让我留级，从头开始。

三年级那年，邻居家一个与我同年的小孩子，爸爸在公社粮食加工厂做机工，拿的是工资，公社大会堂有什么演出，常带他去看。第二天上学，他眉飞色舞地吹牛，让我们羡慕不已。有一天上午，他神秘地拿出一张票给我，说要跟我交好，不要钱，送给我的。我一看，上面的票价是两角钱，很是激动。中午饭后，往常在父母上工前就应该上学去的我，挨到了父母上工。因路上有恶狗，我在草堆里找了根结实的江芦棍子带上，一路往公社走去。六里多的路，直到傍晚才到。到了集上，我先是找到大会

堂，守在门口等。等到七八点钟，渐渐地人多了起来。后来开始检票，我丢了打狗的棍子，挤了上去。我递上手中的票，人家接都没接便说，这是昨天的，没用。可既然来了，我不甘心就这样回去。我与一大帮和我一样没票的人一起守在门口，等待着检票人员开恩，因为有小街上熟悉情况的人说，演出到后期，他们会放大家进去的。果真如此，等了大约一个多时辰，他们终于打开了大门，让我们看了后半场。即使只看了那么一点儿，也很兴奋。散场后，人多拥挤，带去的打狗棍也容不得我找了。我顺着人流出来，由于害怕，一路小跑到家。推开门，一家人都睡了。父母说晚饭焗在厨房的锅里，既没问我去哪里，也没一句责怪。一股暖流立即涌上了我的心头。这件事，给了我很大的鼓励，给我今后的成长壮了胆。后来，我到公社读高中时翻围墙看过几次演出，总是不过瘾。改革开放时期，公社搞集体经济，建砖瓦厂需要碎砖打基础，我便带着我的两个妹妹利用节假日到田间沟头捡碎砖。捡了几千斤，挑到砖瓦厂去卖了几块钱，一家几口到大会堂看了一场完整的戏，是锡剧《珍珠塔》。其情节，至今还记得。方生想进京赶考，没有路费，跟姑母借。势利的姑母一甩袖说：“还猪倌鸭倌呢！”

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牛背上度过的。从八九岁开始，到十九岁高中毕业，我放学后除了割猪草、羊草之外，还比别人多一项任务，就是割牛草。整个暑假，我都整天放牛，和我妹妹一人一头牛。天刚蒙蒙亮，我们就到生产队的“牛汪”里把牛牵出来，赶到大河里，把牛身上的牛粪清洗干净，然后骑上牛，到沟浜、河边看着牛吃草。到了中午，再把牛赶到“牛汪”里休息，下午再牵出来。我们到处找有草的地方让牛吃，吃饱了晚上再把牛送到“牛汪”里。而冬天，则是把牛养在家里，给睡稻草、单被褥的一家人增添了不少温暖。

夏天里，放牛最多的地方，就是县城通往我们公社的公路

边。有时，我骑在牛背上无所事事，看冷清的道路，偶尔经过突突地冒着黑烟的拖拉机、掀起滚滚尘烟的公共汽车。有时，我把牛放在公路边的沟浜上，任其吃草，自己则坐在草地上看蓝天白云，听无休无止的知了叫声，向水中乱扔一通泥块，或拔几根草撕扯着玩儿，不管是乌云密布还是烈日当空。有时，牛受到惊吓，会突然狂奔乱窜，把我从牛背上摔下来。有时，牛白天没吃饱，夜里会从“牛汪”里跑出来。还有挣脱缰绳不服管的牛……每年夏天，时间就像凝固了一样，过得很慢。

我厌烦了这种生活，而我的一些小伙伴却羡慕我有牛骑。有一年秋天，也是在一个假期里，我在一块空地上看牛，一帮小伙伴围着我玩儿。曾经给我过期戏票的小伙伴吃着橘子，并得意地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东西。我从没见过橘子，也没听说过。于是，他就提出，给我半个橘子，让我把牛让给他骑一会儿。这是我第一次吃上甘甜的橘子，而他也是第一次骑上牛。

少年的生活是艰涩无味的，放牛的日子更是无奈而又无聊。牛虻、螨虫、蛇、荆棘、烈日、臭味，完全不是文人墨客笔下的诗情画意。然而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放牛，渐渐地，我发现了一个陌生的伙伴儿，和我们一样，每天来到这马路边。我是看牛，他是扫马路。每天早晨和下午，他趁着凉爽，握着我们常见的竹扫帚，在树荫下不紧不慢地把飞溅到路牙处的石子往路中间扫。日子久了，不免生出许多羡慕来。在树荫下工作，能拿工资，而且一天干两三个小时就能回家休息。如果将来能做个马路工人多好啊！虽然还少不更事，但当时的我明白，那只是白日做梦，根本不可能实现。做马路工人，至少要有城镇户口。而我一个农村孩子，本事再大，最后也得回农村种田。男孩子满十八周岁就要去“挑大河”。因而，每每有这样的念头冒出来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摇摇头，告诉自己，那只能是个永远的梦想。

我看牛的那些日子，正是打倒“四人帮”、恢复高考制度、

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期。虽然我们的生活改变是缓慢的、看不见的，但作为改革的先声，文学却风起云涌。

我们旁边的大队有个代课教师，文化水平不高，但坚持文学创作，几经努力，一举成名。他写小说，写电影剧本，名声一度超过了写农村题材的著名作家。他进了城，老婆孩子也跟着进了城。他的故事，让许多农村孩子乃至成年人产生了遐想。

虽然，母亲是一个绝对的文盲，父亲只读过两三年书，但艰难的农村生活，使他们认识到，读书也许是改变家庭命运的唯一办法。

我读小学的时候，一年夏天，晚上父母亲收工后，回来晚饭还没来得及烧好，就到生产队开会去了。我们兄妹几个眼巴巴地守在门边等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们才回来。一进门，他们就说，开会是为了推荐读高中的人选，推荐的是大队干部的子女。人选是预先定好的，推荐只是走走形式。母亲当即感觉到，像我们这样的家庭，孩子成绩再好，也不会被推荐。黑暗中，失望的母亲跟我这个唯一的儿子说，宏儿头，你要好好学习，世道不可能永远是这样。就是到时候推荐不到你，只要你成绩好，妈妈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读高中。因此，从我小的时候，他们就鼓励我好好学习。家里不管多忙，只要我是在学习，他们就不埋怨。只要是为了学习，晚上耗多少煤油，他们都不心疼。不管“读书无用论”多么盛行，他们都毫不动摇。从生产队收工回来，只要看到我在学习，他们就会欣慰地表扬我。开学了，没有学费，妈妈去借。没有笔了，妈妈拿几个鸡蛋去换。冬天没有棉袄了，妈妈厚着脸皮去找生产队干部，申请救济。没有吃的，妈妈到远在他乡的外婆家去讨。她坐轮船、乘汽车、蹲码头、走水乡，一头挑着我小妹，一头挑着五十斤大米，粗一口，细一口，想方设法把我们喂饱。

1980年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公社的高中。在我看来，这

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然而，每当我从学校回来，遇到在地里劳动的曾经的同学时，他们艳羡的目光让我感到十分奇怪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村头的桥上遇到了一位在邻近大队学校教书的姓王的老师，他的一席话让我知道了其中的含义。他问我是不是某某家的孩子，我说是的。他感叹说，世道变了。我不解地看着他。他说，要是在以前，像你们这样家庭的孩子，成绩再好，也上不了高中啊！

上了高中，我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学梦更加具体和强烈起来。当时的我并不知道，当作家需要有天赋和深厚的文学功底。而我，小学时除了看过几本小人书之外，没有看过一本正经的文学书籍。上初中时，我也只读过两本书，一本是《木偶奇遇记》，一本是《雷锋的故事》。上高中后，我跟同学借书读，白天读，晚上读，在教室里读，到人家浴室的门灯下借光读。记得有一个星期天，我一天一夜没睡觉，读完了一部厚厚的《保卫延安》，累得头昏脑涨。班上订了一份《中国青年报》，每周都有一个小栏目，解析古诗词。每期我都抄下来，记在一个小笔记本上，没事时背诵、吟咏。为了读到更多的书，我把自己的生活费省下来，订文学刊物。当时刚刚创刊的《语文月刊》我持之以恒地订阅，通过阅读打下了较好的文学基础。

书读得越多，梦想就越强烈。上课时，我常常想入非非，构思一些故事情节，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把它们写出来，一鸣惊人。想着想着，有时就动起手来，把许多用过的考试卷子集中起来，背面朝外，对折起来装订成杂志的模样，把自己瞎编的故事用钢笔一笔一画地写上去，幻想着有一天它能变成一本书。与此同时，我偷偷地向杂志社投稿，自然都是石沉大海了。但有一年年底，学校传达室的老头突然送来了一封信，是中学生杂志社编辑部寄来的，里面是一页类似贺年卡的彩色卡片，说是感谢我的投稿，感谢对他们刊物的支持。同学们都很好奇，问杂志社怎么会

寄信给我，是不是投稿了。我不好意思承认。我的同桌——一个很骄傲的男孩不屑一顾地说，你投的稿子，人家揩屁股都不要！

虽然当时感觉很伤自尊，也不服气，但现在想来，他说的对。小学里，许多老师本身只有小学文化。老师不够，学校就把一天书也没教过的从苏南下放过来的家庭妇女请来代课。记得有一个妇女不会讲普通话，用一口无锡方言给我们读《社会发展简史》，把“社会主义社会”读成了“啥会组义啥会”。而我的一个做代课老师的远房叔叔，为了追求普通话效果，把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读成了“将狗命进行到底”。当时读的高中，是我们公社最后一届，好的老师早就被抽调到重点中学去了。我们考大学，谁也没有希望考上。不仅谁也没有希望考上，而且预考一个也不会通过。最后还是教育局分了几个名额，让我们学校成绩最好的几个到考场去走了一趟。

眼看就要高中毕业了，毕业后的出路成了要解决的现实问题。毕业前的一个冬天，我和母亲在地里劳动，恰逢生产队队长也在。我们试探着向他提出，毕业后让我学木匠。当时生产队里对社员从事手工业还是严格控制的。谁学手艺，都要生产队领导同意。被批准学手艺，不仅不用去“挑大河”，而且可以吃百家饭，从事人人羡慕的职业。这位队长听了，不假思索，就给予了回绝。他说，我们生产队里学手艺的太多，不能再增加了。他说的也是实话。胳膊拗不过大腿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再也没提过这事。

其实，我心里清楚，当作家的梦是虚无缥缈的，即使通过努力有这种可能，也要先解决自己的出路问题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国家鼓励群众开展多种经营，报刊亭里的相关书籍多了起来。我从报刊亭里买了一本教农民发财致富的书，认真研究起来。研究来研究去，觉得养殖蚯蚓、黄鳝及在稻田里养殖非洲鲫鱼是最可行的，投资小，方法简单。从这本书里，我第一次知

道，黄鳝小的时候雌雄一体，长大以后，体形大的为雌性，体形小的为雄性。这年夏天，我鼓动父亲和我一起在自己家水稻田里试养非洲鲫鱼。结果自然是水稻没长好，鱼也没卖几个钱。

母亲不甘心我走他们的老路。我高中毕业后，她四处托人找关系，让我复读。我的叔伯哥哥首先站出来担起了责任。他说他有个战友家住在南阳中学后边，靠着学校，也许学校里有熟人。说去就去，但总不能空手去啊！去求人办事，总得带点儿东西吧！带什么呢？家徒四壁，什么也没有啊！房前屋后地找了一遍，最后没办法，只好从地里摘了两个南瓜带上。知道拿不出手，但也没办法。两个人骑自行车，赶了几十里路，到了他们家。人家说学校里没熟人，没办法。二人败兴而归。此后又陆陆续续求了许多人，都说没办法。最后，母亲想到了我们中学校长的家属，也是一名老师。她们有一次坐公共汽车时闲聊过几句。谁知这位老师非常热心，非亲非故，却把我当自己的儿子看，动用了她所有能动用的关系——同学、同事、朋友……首先想到的是邻近的小海中学。她带我们去找小海中学的校长时，不知从哪里找了二斤带壳的花生带了去。这位校长又矮又胖，不知是找他的人太多了，还是他天生就是这种性格，回绝了我们之后，他追着把我们留在他家的花生送出来，气呼呼地往挂在我自行车大梁上的口袋里倒。由于袋口没来得及完全打开，花生洒了一地。我们只好灰溜溜地一个个捡起来。没办法，她又带我们转战别的学校。先是让我在一个普通中学读了一学期，而后又找到了她当教育局局长的同学，把我转到了一所重点中学——新丰中学。这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户，使我的文学梦有了一种可能。

我去的时候，正是高二的下半学期，学生文理分班。我插进了文科班。我语文基础很好，几乎不需要花多少课外工夫，而政治、历史、地理大家都才开始学，在同一起跑线上。于是，我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基础比较差的数学、英语上。由于我的作文比较

好，常常被老师拿来作范文让同学们学习、参考，我的文学梦想更加强烈起来。老师发现了这一苗头，就专门找我谈心，说现在只有好好学习，先考上大学，这一梦想才能实现。

其实，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下，就是让我去想，我也没精力去想。既然走出来了，就只有背水一战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考不上，自己没有前途，也不好意思回家乡。为了支持我，大妹初中一年级没上完就回家劳动，夏天到砖瓦厂做砖坯，冬天和大男人们一起到海边迎着呼啸的寒风割草卖钱。父亲每年夏天都到砖瓦厂租一条五六吨的水泥船，每天一大早便一个人撑船到几里外，从大圩上挑一船土送到砖瓦厂，再一担一担地挑上岸，送到土堆上。有时一天一船，下午再回家劳动。有时一天两船。挑两船时就在厂里蒸饭吃。有一天中午，我伯父经过砖瓦厂，看到父亲在厂食堂吃饭，净吃干饭，五分钱的菜汤都不舍得买。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不需要。但谁都清楚，他是为了儿子上学。伯父狠狠地把他骂了一顿。为了帮我筹学费，到梨子成熟的时候，父亲用两块钱做本钱，隔三岔五地打早工到海边人家的梨园，贩卖人家掉在地上的杻梨赚些小钱。有一年开学，生活费十三块多，我交的全是分票、角票。生活班委数了好半天也没数清，急得问我家是做什么生意的，怎么净是这种票子。

家人的支持，既是压力，又是动力。

刚到学校时，成绩排在班上后几名，老师就安排我跟成绩差的学生同桌。每次考试过后，我都觉得考得不好，很伤心。这样下去，前途在哪？我常常在上晚自习时偷偷地躲到走廊里流泪，吹吹凉风，看看远方的万家灯火，然后擦干眼泪，回到教室里加倍努力学习。冬天没有棉鞋，只穿一双单布鞋，脚后跟和脚趾都生了冻疮。冷的时候用左脚砸右脚，痒的时候用右脚搓左脚。鞋面破了、鞋跟裂了，自己拿针线补补。冬天的一个深夜，我突然从梦中惊醒，感觉天亮了，一个人悄悄地穿上衣服，到宿舍外一

看，满天星斗，刚刚夜里十二点，才又回到床上睡觉。奇怪的是，我每次考试都感觉不行，但每次分数出来，排名都往前进了几名。有一次地理测验，考过后感觉肯定不及格，报了分数之后也确实没及格，但却是班上第二名——全班只有一个同学及格。报到我的分数的时候，全班同学都惊异地回头看我，想不到我的进步会如此之快。随着名次的上升，老师不断地给我调座位，最后让我和班干部一桌。第二年高考时，我进了班级前八名。

说好不来接的，但父亲还是来了。高考后的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驮着我的行李往家骑。一路上，人昏昏的，没有一点儿力气，几乎要从自行车上摔下来。半路上，路过一个小集市，父亲说，买点儿早饭给你吃吧。我说不要。那时我就想吃“烧瓜”，即“菜瓜”。我跌跌撞撞地从自行车上下来，吃力地把车子支在路边，一屁股坐到了泥地上。父亲到集市上去买了半条菜瓜，我三下两下就吃了下去。人还是没劲。父亲说，还是去买碗面条给你吧。我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。父亲拿了我平时吃饭的茶缸子，又去了集市。我实在累得不行，也顾不得行李，找了两块砖头做枕头，在路边的泥地上，以树荫作被，竟睡了过去。感觉刚睡过去不久，父亲就把我叫醒，说不早了，叫我吃面条。我说我才睡下，他说我已睡了两个多钟头了。看看日头，已要到正午了。

虽然早就知道了分数，公安局的也来政审过了，考取警校是意料之中的事，但当邮递员真的把录取通知书送来时，父母亲却呆住了。父母亲在家里，整整一个下午，什么事也没做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就那么呆呆地坐着。时间像静止了一样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那一幕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我后来才明白，那时父母亲虽然表面平静，但内心却是翻江倒海。他们感觉自己在做梦，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。虽然警校只是个中专，但那时，一个公社一年也考不上几个。考上了，就意味着以后子子孙孙要变成城里人了，再也不用“挑大河”了，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了，意味

着……有许多可见的意味着，也有许多想不到的意味着。

考取了，我丝毫没有激动的心情，只是从同学处找来几本名著回家读。我感觉我欠的太多了，我恨不得把我所知道的名著一口气全部读完。上了警校，我更是疯狂地四处借书读。记得有一段时间，我感觉莫名其妙地心情不好，不知什么原因，百思不得其解。最后，发现是我正在读的一本书惹的祸。我正在读俄国的名著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读到女主人公卧轨自杀前的那段心理描写时，无形中受到了影响。在囫囵吞枣地读书的过程中，我挖空心思找素材、写作、投稿，但都是有去无回。在借名著读的同时，我喜欢逛报刊亭，看人家报纸、杂志上的文章，进行模仿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一份新创刊的《社会科学报》，觉得很有意思，上面有许多争论改革开放中遇到的热点问题的文章。我买了一份到学校细读，发现上面有一篇关于“任人唯贤”的文章，观点有问题。我拿笔写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，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，阐述了“任人唯贤”与“任人唯亲”是相对于本阶级利益来说的，有其相对性，等等。没想到，文章投到报社去，竟然真的被用了。虽然只有豆腐块那么大，但它对我来说是“零的突破”。文章的标题下赫然写着“江苏省人民警察学校骆圣宏”几个字。同学们围着我争相传看，有的说，怎么看不懂啊！我想把我的喜悦跟家里人分享，就寄了一份样报给我的叔伯哥哥。寒假回去，我问他，有没有收到我的报纸啊？他说收到了，但不知是什么意思，上茅厕用了。

参加工作以后，我借书、买书读，订阅各种文学杂志，并参加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自学考试。我系统地学习中文，学完了大专，学本科。在从事公安工作的过程中，我接触到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，体验到了人生的各种滋味。我准备先从社会新闻和人物故事写起，用文学的手法写真实的人生百态，用纪实的手法写虚构的文学故事。虽然这些作品登不了大雅之堂，与纯文学的要

求还有很大的差距，但在讲述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或虚构的故事时，我融入了自己对社会、对人生、对各种事件和社会现象的思考和感叹、情趣和评判、无奈和期望。当全国各地的约稿信、约稿电话接踵而来时，我已不在乎自己能不能当一个作家，自己的作品是高雅还是通俗。我考虑得更多的是，我的作品能不能吸引人，能不能给人一点点启迪，能不能给社会提供正能量。我更加享受的是写作给我带来的快乐和满足、煎熬与快感！

梦想的意义不在于多大程度的实现，而在于她赋予了你人生的意义，让你领略了一路的风光，品尝了追寻中的苦与甜。

亦风亦雨五十载，
素心追月三十年。
牛背生梦云胜锦，
警营纵笔剑作弦。

对我而言，还有一个收获：我的女儿也成了一个追梦人！

我深知，吾辈不是什么名家，没有什么惊世大作。我只是想借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之机，对自己的前半生做一个小结，也是对自己后半生的一个提醒：不要辜负了你的前半生！

2014 年秋